

清代顺、康、雍、乾时期文字狱的地域分异研究

朱 竑^{1,2}, 安 宁¹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文化和思想的专制统治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种常见的专制统治手段。文字狱作为其典型产物, 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1644~1795年)发生的文字狱作为分析样本, 力图从区域差异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区域人文、经济、政治等因素对文字狱的地域分异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 人文环境决定了文人群体必然直接影响到文字狱的分布, 而经济环境则通过影响教育水平和社会环境从而间接影响了文字狱的分布, 政治事件、统治者性格、统治方式、政治地位等政治因素对文字狱的地域分异的影响则充满了偶然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分布呈现出由“离散型”分布向集中度较高的“背弓型”分布演变的规律, 这是人文、经济、政治等历史地理要素对文字狱地域分异综合影响的反映。研究弥补了历史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试图从地理学的视角探索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规律, 不仅具有历史文化地理方面填补空白的价值, 同时对现今自由文化之发展也具有警示意义。

关 键 词: 文字狱; 地域分异; 清代; 顺、康、雍、乾时期

中图分类号: K90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1)01-07-08

中国封建历史上文化思想专制统治由来已久。汉^①、南北朝^②、北宋^③、金^④、元^⑤、明^⑥、清^[1~4]等时期都曾不乏厉行文化思想统治的先例。中世纪时期欧洲也长期处于文化思想专制的统治下^[5]。即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文化思想的专制行为也屡屡发生。民国末期国民党政府对国统区实施的白色恐怖^[6]以及20世纪60~7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7]都是文化思想专制行为或思潮之反映。据史料记载, 中国清代的顺、康、雍、乾时期(1644~1795年)是古今中外文化思想专制最高度集中的时期。其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文字狱对文化思想及文化人士的极度摧残^[8]。

“文字狱”系因文字的缘故而构成的罪案, 其实质是当事人并没有相应的行为, 而统治者却吹毛求疵, 有意罗织, 或仅仅根据其文字的只言片语就臆断其思想倾向而治罪。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 深受“夷夏之分”等传统思想影响的

汉族知识分子对清统治者充满敌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 清统治阶级借助于大兴文字狱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严厉的思想文化专制, 并通过镇压那些在作品中流露出不满情绪的文人, 达到取缔“异端”思想之目的^[9]。康熙二年(1663年)的“《明史》狱”和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南山集》狱”都是因为作者在其作品中流露出不满清朝统治、怀念明朝情绪而遭受到的严厉镇压^[3]; 雍正对“心怀怨望, 讥刺时事”的人也毫不手软^[10, 11]; 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的20余年间, 文字狱也连年兴起, 如彭家屏案、蔡显案、王锡侯案、徐述夔案^[2, 3]等, 其目的都在于控制民间的反清思想。

国外对中国文字狱的研究可谓罕有, 仅Schwarz等从文化自由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专题探讨^[7], 对中国清代文字狱的专题研究还几无涉猎。国内学者对文字狱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历史学、社会学等范畴。如从文字狱发生到恶

收稿日期: 2010-06-09 修订日期: 2010-10-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1067),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10251063101000007)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7-0889)。

作者简介: 朱 竑(1968-), 男, 甘肃临夏人, 博士, 教授。研究领域: 文化地理学及旅游地理学。E-mail: eeszh@mail.sysu.edu.cn
① [东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宣帝纪第八》, 256。
② [北齐]魏收撰《魏书》帝纪第四, 下, 《世祖太武帝纪》, 104。
③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苏轼列传》, 10810~10818。
④ [金史]卷一百二十九, 《佞幸列传》, 2779~2780。
⑤ [元史]卷二十七, 《英宗本纪一》, 605。
⑥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41。

化的原因进行的分析,认为文字狱发生的原因与统治政策、民族矛盾等因素是分不开的^[12~14];也有研究从对社会的影响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清文字狱对社会,尤其是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甚至延缓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15~16];还有从图书馆学、政治制度、法制以及纯文化角度对文字狱进行的阐述^[17~20]。总体来看,由于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国内外学者对文字狱现象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微观角度着手进行细致的解读,而缺乏从宏观角度对文字狱现象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研究。近年来国内外人文地理学者对人文现象的地域分异的相关研究逐渐展开^[21~24],但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对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专制此类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尚属空白。从地理学角度对文字狱现象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局限性,同时其对传统文化地理研究内容的扩充和发展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1 顺、康、雍、乾时期文字狱的地域分异特征

清代文字狱自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起始有发生。雍正、乾隆时期达到高潮,嘉庆之后渐

式微^[3]。据文献记载,顺、康、雍、乾 4 个时期共发生 163 起文字狱案件,其中明确著录案发地点的有 159 宗^[2],这些文字狱案件的地域分异具有鲜明的特征。

1.1 文字狱地域分布的时空渐变性

自顺治到乾隆时期文字狱地域分布具有明显的由个别地区向其它地区扩散的趋势。同时,也有由离散分布向集中分布变化的特征。顺治时期文字狱仅发生在苏、豫 2 个省份。而康熙时文字狱则在苏、浙、皖、鲁、豫、湘、鄂 7 个地区出现。到雍正时期文字狱已扩散到全国 9 个省。在乾隆时期文字狱更是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份。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影响波及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在顺治、康熙、雍正各时期,各地区的文字狱数量分别都不超过 5 起,地域分布属于“离散型”的散点式分布,并没有集中点;但到乾隆时期,文字狱在各地的分布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全国 20 个地区就有 125 起文字狱发生,其中苏、浙、湘、赣等 4 个区域共计发生 57 起,竟占 45.6%,呈现高度集中的特点。另有 11 个地区文字狱数量在 5 起以下,较为分散。这个时期文字狱分布有集中区域,因而呈“集中型”分布(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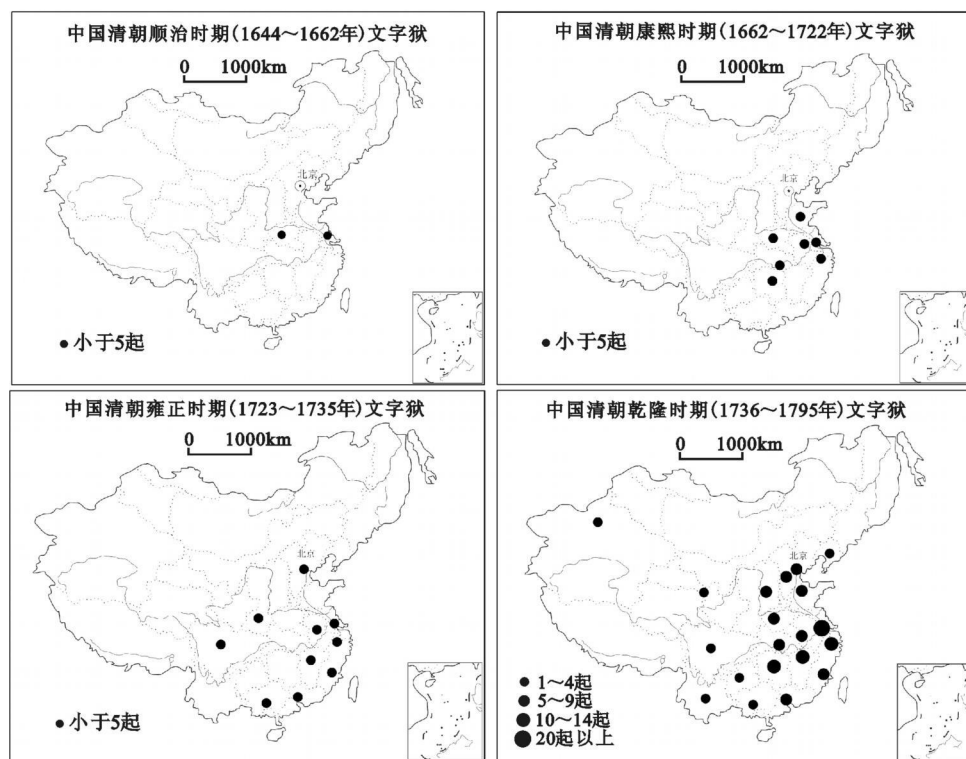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清代顺 (a)、康 (b)、雍 (c)、乾 (d) 时期文字狱分布及变化

Fig 1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vicissitude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Shun-Kang-Yong-Qian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1 2 清文字狱的“背弓型”空间分布

顺、康、雍、乾 4 个时期的文字狱在地域分布上具有不均匀性。据统计,黄河 巫山-雪峰山以东的东部地区是文字狱的集中区域,共计发生文字狱 144起,占总额的 90.6%;此线以西的 7个省域共计发生文字狱 14起,占总额的 8.8%;而长城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仅在盛京(今沈阳)发生文字狱 1起,占 0.6%。其中,在东部集中区域的 144起文字狱中,华北地区共计为 38起,占 26.4%;以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为主的南方地区共有 106起,占 73.6%^[21]。这与王会昌所描述的同一时期人才空间分布特征极为相似:南盛北衰、东强西弱^[25]。东部沿海各州府文字狱都相对比较严重,因而其分布随着海岸线呈弓弧状,其中以江、浙地区最为密集;而由东向西,文字狱的蔓延越过黄河-巫山-雪峰山一线后有了极大的缓和。总体来说,文字狱分布的不均匀和极端集中最终导致其在空间上呈“背弓型”分布(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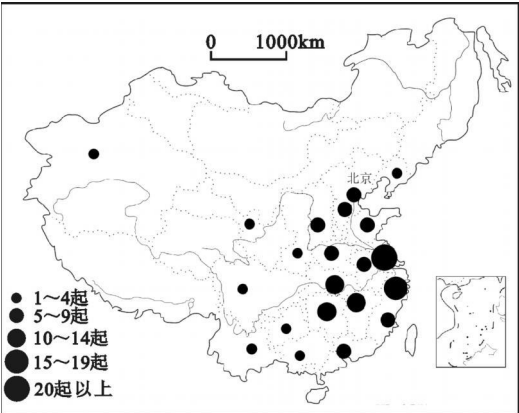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清代顺、康、雍、乾时期 (1644~ 1795 年) 文字狱地域分异

Fig 2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from 1644 to 1795

1 3 文字狱地域分布与人文、经济环境的拟合性

文字狱的地域分布与区域人文、经济环境有一定的拟合性。区域人文环境愈浓厚、文人愈多,该区域的文字狱就相对较多,反之则文字狱相对较少。本文选取清代顺、康、雍、乾时期进士数量^[26]为区域人文环境的指标^[27]进行了分析,得到文字狱案件数量与各地区进士数量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827,呈显著性正相关;区域经济愈发达,文字狱

相对较多。反之,区域经济愈落后,文字狱就相对较少。本文选取各地的人均民田、学田数据^[28]作为区域经济环境的指标进行分析,得到了文字狱案件数量与各地人均学田、民田亩数的相关系数为 0.579,亦呈显著性正相关。这说明文字狱与区域人文、经济环境存在正相关拟合关系。

1 4 文字狱地域分布的集中性

除了以上特征外,文字狱地域分布还有向少数地区集中的趋势。文字狱集中在东部地区,共有 144起,占总数的 90.6%;东部地区又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苏、浙、湘、赣、鄂、皖等 6 个州府地区共计 92起,占东部的 63.9%;此区江浙地区又最为集中,共有 47起,占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 51.1%,集中分布的趋势十分明显。本文分别从以上 3 个层面对文字狱地理集中指数^[29-30]进行了计算得到结果如下(表 1),进一步证实了文字狱在地域分布上的集中性。

表 1 中国清代顺、康、雍、乾时期 (1644~ 1795 年) 各区域文字狱地理集中指数

Table 1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es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regions during Qing Dynasty (1644- 1795)

区域层面	全国层面	东部地区 层面	长江中下游平 原地区层面
文字狱地理集中指数	91.1	69.8	56.9

注:地理集中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某类事项在地域上的集中

分布和扩散程度,计算公式为: $G = 100 \times \frac{\sum_{i=1}^n \left(\frac{X_i}{T} \right)^2}{n}$ 式中: G

为有文字狱发生的区域的地理集中指数; X_i 为该区第 i 个文字狱发生地的文字狱数量; T 为该区发生的文字狱总量; n 为该区文字狱发生地地总数。 G 值在 0~ 100 之间取值,越接近 100,该事项来源地越集中;越接近于 0,则来源地越分散。极值 100 表示该事项来源地只有 1 个, 0 表示来源地个数趋近于无穷大^[29-30]。

2 人文环境与文字狱地域分异的关系

2 1 文字狱分布的文化背景

在清军入关前期,清廷采取了投降汉族官僚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以高官诱降明朝故吏,在汉族以官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中形成拥清势力,同时又大开大顺官吏仕清的大门^①,承认他们的功名出身。与此同时,清廷对汉族其它阶层则采取高压政策,对汉族知识分子亦有警示的意思。这种威逼利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

诱下清廷迅速笼络了汉人政权遗留的大量知识分子。清政权建立后,对于新生代的汉族知识分子清廷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立即恢复科举制,广揽天下士人以显示清廷对人才优待的态度^①。虽然,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怀柔远甚于强权,但汉族知识分子对清廷却抱有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明大部分官僚受笼络政策向清廷卑躬屈膝,汉族中的绝大部分新生代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考,如顺治二年(1645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战乱的情况下,清廷于顺天首开乡试,应考的秀才就达3000余人^②。之后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也都对科举十分热衷。这一群体是汉族文人中的主体,而文字狱发生的对象群体是文人,因而这一群体的分布与文字狱的分布有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与趋之若鹜的前朝官僚和热衷于科举的新生代汉族知识分子不同,有一些怀有民族士大夫情结的学者以前朝遗民自居,他们毅然扛起抗清大旗,或参与秘密组织,或修学救世,或著书立说唤醒世人。他们的民族情结、思想与清廷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一文人群体是很容易遭受文字之狱的群体,如孙奇逢《甲申大难录》案、黄培诗案牵连顾炎武案^[3]等都是针对这一群体的文字狱案件。

2.2 文人分布与文字狱分布的关系

159起文字狱案件中因“著逆书”而下狱的有79起,因诗词存悖逆之语下狱的有35起,还有36起是因奏折、榜文、书信、笔记等应用文章中存在违碍文字。另外9起是“妄布邪言”之故。由此可见,文字狱与文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文字狱的分布与文人自身分布分不开。没有文人的存在就绝不可能发生文字狱。

在科举取士的时期,考取进士的文人,一般都具有深厚的经学、文学功底^[23],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区域文化水平。当时政府对各地进士名额进行了限制,这虽然在某方面掩饰了人才分布的不平衡,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府机构对各地区人文水平的综合评价,因而进士分布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区域人文水平。

清顺、康、雍、乾4个时期的进士在地域分布上也具有不均匀性和集中性。东部地区文人荟萃,在统计的13775名汉族进士中有12223人,占到

88.7%,其中苏、浙、湘、赣、鄂、皖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共6182人,占东部地区的50.6%;豫、鲁、晋、京畿等华北平原地区共计4880人,占东部地区的39.9%;粤闽等东南沿海地区则有1161人,占东部地区的9.5%,文人“39.9%—50.6%—9.5%”分布结构与文字狱“26.4%—63.9%—9.7%”的“背弓型”空间分布结构极相似。而文人分布的集中性与文字狱分布亦有神似之处,都是东部→长江中下游→江浙不断集中的趋势,在集中比例上文人“88.7%→50.6%→61.1%”与文字狱“90.6%→63.9%→51.1%”更是惊人的相似。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人比例50.6%与对应区域的文字狱比例63.9%相比略小。研究发现,苏、浙、湘、赣、鄂、皖等地区中湘仅有223名进士,数量远少于其它几个州府,而这一区域的文字狱却有14起,高居全国第三。进一步研究证实,湖湘地区正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怀有士大夫情结的以前朝遗老自居的文人比较集中的区域,他们誓不仕清,在以岳麓书院为核心的地区虔心治学,“士为秀民”,他们对当地的人文风气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导致这一地区进士数量的减少,同时他们的思想与清廷发生直接的冲突,也是文字狱高发的重要原因。

2.3 文人影响文字狱分布的方式

文字狱的形式主要有著“逆书”,收藏“逆书”,书写悖逆讥讪诗词,奏折、书信、榜文、笔记等书写狂妄之语,不避庙讳,妄布邪言^[3]等。而这些行为基本上都与文人的生活分不开,如著书立说、收藏书籍、吟诗作赋都是一定水平文人的生活习惯,而书写书信、笔记等应用文是文人日常生活之行为。因而每一起文字狱都会与至少一个文人相对应,甚至是对应很大一个文人群体。文人因其生活习惯以及日常行为成为文字狱的直接和唯一受体。因此,文人总体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文字狱发生可能性的大小。文人越多,文字狱相对就多,如江浙地区学风盛、进士多^[25,26],顺、康、雍、乾时期进士数量分别为1999人和1781人,分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位,而同期该地区的文字狱也十分严重,分别发生28起和19起,高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位;相反,文人总体数量越小,发生文字狱的可能性就越较小,如甘肃地处边陲,文风羸弱,该期间仅有进士14人,故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八。

② 《清世祖实录》卷十三。

而文字狱案例也比较式微,仅发生 1 起。可见文人分布与文字狱分布不是偶然的相关,而是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3 区域经济与文字狱地域分异的关系

3.1 文字狱分布的经济背景

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从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644~1722年),历时近 80 a。其中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年(1644~1681年),恢复缓慢,这与政府实行圈地、投充、逃人、禁海等破坏行为以及三藩之乱有关;战乱后,社会进一步稳定,清统治者也相应地调整了经济政策,采取措施改革秕政,与民休息,奖励开荒,减免赋税,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全国耕地由顺治时期约为 5 亿 2 000 万亩(约 346 667 km²)到康熙后期已接近 9 亿亩(600 000 km²)^[28];雍正时期继续调整和加强发展农业,用耕田礼和授予老农顶戴等方式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兴修水利,鼓励农林牧业并举,并实施重农不抑商政策,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乾隆时期在农业得到极大的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实现了经济的不断繁荣^[31]。

因自然、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呈现不均衡的现象: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便利的交通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农业、手工业都十分发达,其中江浙地区最甚;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华北平原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发达区,虽然因战乱等影响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其传统经济地位依然不可撼动;东南沿海地区因其宽松的环境而商业经济发达;西南、西北皆为少数民族聚居为主的区域,在奖励开垦的政策扶持下经济开始起步,但是难免受到自然条件的局限而发展缓慢^[31]。

3.2 经济对文字狱分布的影响

文字狱分布受文人分布影响。文人的涌现则靠教育,教育的发展靠经济。经济越发达,百姓受教育的机率越大;同时经济越发达,承受教育的人口基数也越大。较大的人口基数乘以较大的受教育机率,文人数量自然就多。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江苏拥有人口 23 779 812人,居全国第二位,占 11.3%^[28],而同年丙戌科考则有 28 名江苏籍进士,占 13%^[26],居全国首位。同样,文人越多,文字狱出现的概率就越大。因而经济通过影响文人分布而影响文字狱分布,在其作用下,文字狱

呈现如下分异现象。

3.2.1 经济发展对文字狱分布时空变化的影响

顺、康、雍、乾 4 个时期经济的发展与文字狱分布的时空变化有必然的关系。顺治时期(1644~1662年),文字狱仅发生于苏、豫两地,而此时经济正处于一片萧条,政府也没有采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康熙时期(1662~1722年),文字狱扩散到苏、浙等 7 个州府,这个时期清统治者正颁行一系列的经济措施以促进经济的发展^[9];雍正时期(1673~1735年),奖励开垦、屯田边疆、兴修水利等措施厉行,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而此时文字狱也扩散到全国近 10 个州府;乾隆时期(1736~1795年),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达到“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但是文字狱却也扩散到全国 20 余个州府,经济发展与文字狱的地域扩散呈正相关趋势^[3.9]。

政局混乱、经济羸弱的时候,一方面,统治者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理会著书立说、诗词笔记、胡乱言语方面的纰漏;另一方面,经济的衰败,对人文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文人在战乱中、在饥寒交迫中必然受尽苦难,著书立说、吟诗作赋的条件也大大地恶化了。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象征,随着经济的发展、局势的稳定,清统治者的注意力也向思想领域转移,人文环境也随着经济的好转而好转,两个方面都有利于文字狱的蔓延。因而文字狱扩散也就成为必然。而文字狱分布由“离散型”向“集中型”变化也是经济状况长期影响的积淀。顺、康时期,经济处于恢复时期,经济的地方性并不明显,加之案件相对较少,显得分布比较零散;而在乾隆时期,经济局势十分稳定,区域经济优、劣势明显,清统治者注重文化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文字狱猖行,因而文字狱的地域集中性也比较明显。

3.2.2 区域经济与文字狱分布的趋同

全国经济整体发达程度与文字狱扩散相关,而且区域经济发达程度与文字狱的地域分布也基本吻合。长江中下游流域苏、浙、湘、赣、鄂、皖等州府是农业、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每年上缴赋银、赋粮占全国 50% 以上^[28],而这些州府同时又是清顺、康、雍、乾等时期文字狱最集中的区域,占 60% 左右;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主的华北地区,是自古以来的农业中心,农业技术先进,经济发达,部分州府如山东、直隶、河南等都是居于全国前列,同时这里也是文字狱的高发区域,38 起案件占全国案件

总额的 1/4 东南沿海地区因广州府、泉州府对外贸易的关系而商业经济较为发达,思想也因此比较活跃,同样也是文字狱较为高发的州府之一;西南、西北区域经济基础较差,开发也比较晚近,经济进步缓慢,加之少数民族比例大,文字狱的数量也比较少。

区域经济也有集中的特征,经济发达区集中在巫山-雪峰山以东的东部区域,经济最发达地区则是长江中下游流域平原,经济最发达的州府则是江苏、浙江,江浙地区的赋银、赋粮都是居全国州府的最前列,超过其它州府近 10 倍。其集中特征与文字狱“90.6% → 63.9% → 51.1%”的集中分布特征十分相似。

4 政治与文字狱地域分异的关系

4.1 文字狱分布的政治背景

顺治四年(1647年)冬,清军在南京城盘获了一名叫函可的和尚,从他身上搜出南明福王答阮大铖的书信和一本名为《变记》的史稿,其中记录了抗清志士的悲壮事迹^[4]。摄政王多尔衮命将函可械送京师,后流放到沈阳,自此拉开文字狱的残酷序幕。一年后大学士刚林(满族人)又揭发毛重倬坊刻制艺不书写顺治年号有碍正统,这说明清满族统治集团开始维护正统地位而有意去追究汉人文字中有意或无意的疏忽了^[3]。

如果说文人是文字狱的受体,经济是文字狱发生的基础,那么政治则是文字狱的导火索。清军入关所到城镇很少遇到抵抗,而清廷在颁行“剃发令”后则遇到近乎疯狂的对抗。清军也因此制造了嘉定、扬州等惨案。原因是触动了民族矛盾,而这是满、汉两族人民都十分敏感和忌讳的。文字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作为清统治者的有利的政治武器对汉族文化和思想进行专制统治。可以说,文字狱是政治的产物。

4.2 政治对文字狱分布时空变化的影响

文字狱作为政治的产物,它的时空变化烙有深深的政治印迹。顺治帝多愁善感、宽厚爱人,行仁政,平均每年制造文字狱 0.35 起,而初期顺治帝并未亲政,而是刚愎自用的多尔衮执政,研究表明顺治期间的 6 起案件中 5 起都是多尔衮执政时期制造的惨案;康熙帝宽仁大度、胸怀宽广,亦行仁政,平均每年制造文字狱 0.21 起,是 4 个时期中最少的,而且他 8 岁登基,初期也尚未亲政,时为四辅臣

执政(以骄横跋扈的鳌拜为首)。据文献,13 起案件中 6 起是这一时段发生,其中以《明史》案最为惨烈;雍正帝猜忌刻薄、雄摯严厉,行严政,平均每年制造文字狱 1.31 起;乾隆帝稳健缜密、高己卑人,行政宽严并济,平均每年制造文字狱 2.12 起^[3]。

顺、康时期,清统治者无暇放太多的政治注意力在文化思想的统治上,加之他们都比较宽厚仁慈,因而文字狱在地域扩散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偶尔在比较敏感的区域制造一两起案子,警告一下心中悸动的汉族知识分子。而雍、乾时期,文字狱则作为彻底的政治工具被使用。先是雍正帝利用文字狱来打击朋党,后来又转为对汉人思想领域的控制^[9,10];乾隆帝先前认为天下太平了,从而摈弃了文字狱这工具。但“伪稿案”的发生使他人人心惶惶,随之文字狱手段被再次重用。从而文字狱的发生由不小心扩散到有意扩散,最后演变为蔓延之势。

4.3 政治要素对文字狱地域分布的微调

政治对文字狱的地域分布的影响不仅仅在时空角度。一些政治要素如国家级的政府机构所在地、当权者意愿等都会直接影响文字狱的分布。华北平原地区都在国都影响范围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湖是历来都设有总督府并极受统治者重视的州府,总督都是皇帝钦点的亲信。而江浙地区更是因为漕运、教育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而倍受政治青睐;广州府和泉州府因其为主要通海港口受到清廷的重视。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都会极大的吸引当权者的关注。因而文字狱也多是这些州府开始蔓延。当权者意愿影响范围影响文字狱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一点雍正时期的文字狱比较明显,如年羹尧案、汪景祺随笔案、钱名世名教罪人案、谢济世私著《大学》案等,是因为当权者意愿而制造的文字狱案件,这些特殊文字狱案件的分布基本都不受人文、经济的影响。

5 结束语

文字狱地域分异呈现时空扩散性、不均匀性、极度集中性以及“背弓型”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文字狱随着顺、康、雍、乾时间的推移而逐步由江浙等核心文化区域向外扩散。与此同时,其分布也由“离散型”向“集中型”转变。这一特征主要是政治与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者由宽厚到严厉,由无暇注重文化思想统治到刻意进

行文化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 经济愈加成熟发达, 文字狱滋生的温床愈加坚固, 从而导致文字狱的时空扩散和转变; 文字狱分布的不均匀性、极度集中性则是人文环境与区域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区域经济通过影响教育从而影响到文人分布, 文人因其日常生活行为和习惯而牵涉到文字狱, 而且基本上是唯一牵涉到的群体, 其分布最终直接影响文字狱的分布,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一些政治要素如政府机构以及当权者意愿等会对文字狱的分布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背弓型”空间分布则是文字狱空间分异特征的综合表现, 它直观的反映了文字狱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集中趋势等, 是文字狱地域分异的缩影。总之, 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分布与同一时期的人文风气、经济格局大体相似, 政治在局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一定的微调作用。

文字狱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文化现象, 具有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方面双重的研究价值。文字狱地域分异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一方面它扩散了历史地理的研究视角; 另一方面它又是对传统文化地理研究的扩充和发展。历史文化现象的地理视角研究在人文地理研究中的尝试是本文的特色所在。而研究这一特殊历史文化现象的主旨也是希望通过历史经验的借鉴和反思, 能够在更宽松、圣明的氛围下, 推动新时期文化发展的百花齐放和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

参考文献:

[1] 赵尔巽, 柯劭忞, 史 良, 等. 清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74~ 412

[2] 上海书店出版社. 清代文字狱档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3~ 956

[3] 郭成康, 林铁钧. 清代文字狱 [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0. 3~ 45

[4] 朱诚如, 王思治. 清朝通史 [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3. 493~ 498.

[5] 本内特 (美), 霍利斯特 (美). 欧洲中世纪史 [M]. 杨 宁, 李 韵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3~ 4.

[6] 王文泉, 刘天路. 中国近代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261~ 263.

[7] Schwarz H 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 Seattle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2. 3~ 7

[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清史研究集 (第一辑)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 55~ 56

[9] 高 翔. 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198~ 208

[10] 杨启樵.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78~ 88.

[11] 雍 正, 曾 静, 吕留良, 等. 大义觉迷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431~ 443

[12] 王媛媛. 探究清初文字狱酷烈的原因 [J].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21(3): 44~ 46.

[13] 张小兰. 清“康乾盛世”之文字狱 [J]. 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7(4): 7~ 9

[14] 王安东, 刘 莲. 试论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特点及影响 [J]. 东方论坛, 2003. (4): 46~ 51

[15] 张淑红. 浅议清初“康乾盛世”的文字狱 [J]. 社科纵横, 2008. (6): 199~ 201

[16] 黄少卿. 明清文字狱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J]. 沧州师专学报, 2003. 19(1): 26~ 29.

[17] 王 纯. 清代禁书及文字狱考略 [J]. 专业史苑. 2004. (1): 95~ 96

[18] 张运明, 王 瑞. 顺、康、雍、乾时期封建文化建设初探 [J].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20(2): 34~ 37.

[19] 张乐维. 浅谈清朝初期的文字狱 [J]. 法制与社会, 2007, (12): 885.

[20] 王同伦, 翟月霞. 明清文字狱——基于文化的修辞解读 [J].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2): 32~ 36

[21] 许学强, 李胜学.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利用外资的时空差异特征 [J]. 地理学报, 1995. 50(2): 128~ 137

[22] 任泉香, 朱 玟, 李 鹏. 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差异 [J]. 地理学报, 2007. 62(2): 211~ 220

[23] 韩茂莉, 胡兆量. 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 [J]. 地理学报, 1998. 53(6): 528~ 535.

[24] 蓝 勇. 中国饮食辛辣口味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研究 [J]. 地理研究, 2001. 20(2): 229~ 236.

[25] 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 [M]. 武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108~ 171.

[26] 江庆柏. 清朝进士题名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3~ 668

[27] 李润强. 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93~ 301

[28]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539~ 553

[29] 薛照明, 朱 玟. 广东基督教教案的时空演变 (1584~ 1910) [J]. 地理研究, 2008. 27(3): 693~ 702

[30] Alexander JW, Gibson L J. Economic Geography (2nd Edition) [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9. 310~ 340

[31] 陈 桦. 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382~ 390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Shun-Kang-Yong-Qian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ZHU Hong^{1,2}, AN Ning¹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2 Geography School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Despotic government on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matters was shared among all types of dictatorships around the world. As one typical product of this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Literary Inquisition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within cultural geography scholarship. This research tries to approach the issue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with soli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hun-Kang-Yong-Qian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reg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s, loc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olitics were the key determinants that gave rise to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cases; specifically, these determinants included the concentration of literati, educational status of population, soci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events, personalities of the governors, ways of governing and political status. Generally, this study tried to cast light on the cultural autocratic governing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geographic perspective, which was largely ignored by historians and sociologists. It is a valuable endeavor for its attempt in contributing to a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f Literary Inquisition, and it also provides an enlightening less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iberal cultural realm at present time.

Key words Literary Inquisition,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Qing Dynasty, the Shun-Kang-Yong-Qian period